

瑶乡蝶变 折射山地贫困少数民族新生活

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记者柳玉敏、袁汝婷、白田田)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的朱小红,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身为瑶胞的朱小红,以前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通过开办农家乐、在景区务工,不仅全家脱贫,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面对记者,朱小红难掩内心的喜悦,他说:“以前红军给了我奶奶半条被子,如今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日子。”

沙洲村地处湘南边陲,属于罗霄山中连片特困地区,瑶族人口占比64%,全村有142户52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95人,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薄弱,曾经制约乡村发展。

“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湖南的瑶胞有8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永州、郴州、怀化等湘南地区的大山里,早年贫困人口较多。”中国瑶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明生说。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路上,夺取全面胜利,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这是如今沙洲村看得见的变化——建成了红色旅游核心区,道路平整宽阔,老百姓住上了“小洋房”,沙洲村也被评为2017年度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依靠精准扶贫等政策,以前是‘看到屋、走到哭’,如今公路村村通,困守在大山里的瑶民能够顺利下山了,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王明生说。

41岁的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胞赵春花,居住在海拔近千米的东冲河村上,2018年8月,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还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以前在大山里种玉米和红薯,收入来源少,如今在楼下的马达厂上班,每月收入3000元,比过去好多了。”赵春花说。

江华县位于南岭北麓、湖南省最南端,是湖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也是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贫困县,全县人口54万,其中瑶族人口37.5万,被誉为“神州瑶都”。

近年来,江华县向绝对贫困全力攻坚,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引进小微企业实现贫困户稳定就业,增强当地老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2019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江华县脱贫摘帽,越来越多的瑶胞从此走向小康生活。

在湖南省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入夜时分,时常能听到村民们歌唱具有地方特色的“呜哇”山歌。作为当地“花瑶”重要的民俗活动,瑶胞们在歌声中表达对幸福生活的赞美。

依托独特的梯田资源,山背村引进了一家旅游公司,打造梯田景区,建立了香皂花加工扶贫车间,发展猕猴桃等产业,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搬下山后,我在家门口的旅游公司上班,现在的生活条件是以前不敢想的。”花瑶同胞刘美花说。

在湖南省蓝山县,52岁的过山瑶瑶胞赵友竹一家从80公里外的荆竹瑶族乡凌江河村搬进县城安置点,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还租下了一间便利店经营。“便利店生意日益稳定,我这个山民成了个体户,全家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赵友竹说。

一曲曲“呜哇”山歌,一幕幕长鼓舞表演,在湘南山间飘荡。

一张“作战图”指引脱贫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新华社贵阳9月19日电(记者向定杰)“2014年以来危房改造129户,2016年以来易地扶贫搬迁56户……”在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边疆村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贴在墙上的脱贫攻坚“作战图”与扶贫干部朝夕相伴。

这张“作战图”除介绍基本的村情村貌、贫困户、致贫原因、脱贫措施外,还用表格把每一位干部与贫困户的结对关系一一标明。

沿河县是贵州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位于武陵山区深处,自然环境恶劣,边疆村,地如其名,距离思渠镇20多公里,距县城近80公里。

在边疆村驻村扶贫的19名干部看来,“挂图作战”就是无声的命令,时刻提醒着他们保持“临战”状态。处在山沟里的边疆村,6个村民组居住分散,一条坡陡弯急的公路从半山腰盘旋而下,过去去公路时,出村的路是一条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赶集来回需要走4个多小时,群众出行、孩子上学很不方便。

打通山路曾是当地群众最期盼的事。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边疆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村路、通组路、串户路逐步完善。

路通了,如何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怎样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这是边疆村这类边远山村面临的共同难题。

边疆村党支部书记邓文远说,过去村里主要种植水稻和玉米等传统农作物,随着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少田地荒芜。虽然村里近年发展一些经济作物,但受交通、市场、人才等因素影响,产业尚未发挥有效带动作用。

“受客观自然条件的制约,边疆村一直以来存在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2014年贫困发生率高达40.83%。”思渠镇党委组织委员、边疆村脱贫攻坚指挥长晏飞介绍。

他说,作为市县两级出名的贫困村,尽管去年边疆村已出列,但去年底还有13户48人未脱贫,已脱贫的群众也面临一些返贫风险。所以,今年村里充实了脱贫攻坚指挥部力量。

今年2月,作为市级脱贫攻坚督导组,来自铜仁市委办公室的钱鑫来到了边疆村。不善言辞的他,说起自己的帮扶对象陈茂六,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他家住得有些偏远,仅入户路就硬化了500多米!”钱鑫一边说,一边在手机里翻照片。

“村里房子烂,很多都是木板板,产业为零,财政扶贫资金拿到别的村入股,虽然有分红,但哪有自己干好?”这是晏飞今年到边疆村后的最初感受。

对此,今年边疆村争取资金,一口气发展了雷竹、辣椒、茄子、冷水鱼、生态养鸡、金丝皇菊、精品水稻7个产业,利益联结覆盖133户贫困户711人。通过产业带动,村民领到的劳务工资已经有10多万元。

记者在村里看到,边疆村人居环境也大为改观,不少村民的房前屋后已经硬化,室内室外整理得干净整洁。“我们完全有信心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晏飞说,现在谁家住在哪、从哪走、什么生活状况,干部们都了如指掌,脑海里都装着一张图。

“累并坚持!”“不脱贫不撤退!”“再坚守最后几个月!”……工作中,扶贫队员们互相鼓励。“他们从年初进驻村里就很少出去过,当初来的时候个个白白胖胖,现在又黑又瘦。”时间久了,邓文远对每个扶贫队员都很熟悉,也很佩服。

在村委会后面的大山间,“决战边疆 决胜小康”的标语牌迎风矗立。而在村脱贫攻坚指挥部,每天的扶贫工作日志依然在更新。

高原上绽放的光芒

来自青海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故事



▲一位牧民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光伏发电园区内放牧(2019年6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陈凯、王大千、陈炜伟

青海,是民歌中“那遥远的地方”,受平均4000米以上高海拔等自然条件所限,这里也成为决战“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的重要阵地。

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新华社记者于2020年夏秋之交来到这片山穷水尽的土地,聆听浩荡江河、广袤牧场、搬迁新村的回响:一个个脱贫故事,在离天最近的高原大地上,定格成画,汇聚成光。

无际草原上的新村落

从省会西宁驱车向西南方向行驶5个小时,景色也从高楼林立的都市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高原草场。

临近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城,一派秀美气象让记者途中疲乏尽消:一个坐落在碧绿草原中的村落映入眼帘,一排排色彩鲜艳的藏民居错落有致,村中央建有一块标准足球场,正在踢球的孩子追逐嬉戏……

天空格外透亮,人们笑声爽朗。作为海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这个名为“安多”的民俗文化村占地1500亩,安置有涉及48个村的853户、3421名农牧民群众。休闲广场、商业作坊、电商基地和乡村旅游富民设施等配套,让搬迁群众有了“从未享受过的好日子”。

“以前老村里,土房子黑乎乎,用煤油灯。如今在新房子里,用自来水再也不用发愁啦。”65岁的藏族阿妈周德打开话匣子就不停,一连串藏语让负责翻译的当地扶贫干部直呼“跟不上”。

周德过去住在黄河峡谷海拔3000多米的曲什安镇塔洞村,到县城要翻过好几座大山,说起当时艰难的日子,周德直摆手。

为改变“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在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2017年兴海县投资2.1亿元打造了安多民俗文化村这个易地搬迁点。

2018年秋天,周德和贫困户村民们一起搬到安多村。“山上的草场都流转出去了,每年2000多元的租金。”周德掰着手指算收入,“女儿在村里当保洁员,外孙女上小学每天校车接送,我看病全报销,还有低

保等补贴,家里年收入有3万多元。”虽语言不通,通过翻译交流却很顺畅。当记者提到“建档立卡”“低保”等词汇时,特别熟悉这些汉语字眼的她,眼里放着光,总是在笑。

采访临近结束,她追出门来,询问记者:“免费医疗政策好,这一点你们记住了吗?”

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局长久先太说,放下牧鞭的村民们正在政府引导下,积极发展旅游等多元产业,这个新建的搬迁村两年来人均增收2.16万元。

黄河蜿蜒曲折,从兴海县向东300多公里,流经海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两年多前,尖扎县依黄河地势建成了有251套住房的易地搬迁安置点——德吉村,全县7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946名藏族群众走出大山,搬到这里。

德吉村的蓝天,一碧如洗,成排的房屋中央是文化广场,旁边高大的黄河水车缓缓转动。如今,德吉村实现了从易地搬迁村到“网红景点”的转变,游客络绎不绝。

记者走进卓玛太家的民宿,院落里有优雅的小木屋,屋内藏式土炕连接取暖的藏式铁炉,奶茶咕嘟冒着热气。

“就像阳光照进我的家。”卓玛太这样形容国家扶贫政策。以前一家7口年收入不足1万元,在当地扶贫干部帮助下,他使用“关门是家、开门是店”的民宿经营模式,今年暑期旺季每天进账超过3000元。

“德吉”,在藏语中意为“幸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幸福模样。

“十三五”期间,青海省全面完成38个县(市、区)、1249个村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搬迁安置农牧民群众5.2万户、20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3万户、11.89万人。

“太阳照耀在塔拉滩”

登上47米高的瞭望塔,曾经的荒漠戈壁变了模样,高天流云的影子在绵延天际的太阳能电池板上移动。

即便是记者放出高空无人机,也无法全览这个位于塔拉滩的大型光伏产业基地。

“光伏园区有609平方公里,接近一个新加坡的面积。”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徐新彭自豪地介绍,

“青海上个月已刷新的‘绿电百日’纪录,河南、北京等地的‘绿电’,都有这个园区的贡献。”

位于海南州共和县的塔拉滩,昔日是沙丘遍布的荒漠戈壁,也曾是三江源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

“为生活,要养牛羊种地;为生态,需禁牧退耕。两难中,风沙逼走住户,最多的搬迁3次。”共和县恰卜恰镇西台村党支部书记马进学说。

如何破解生态、贫困的双重难题?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贵德,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再到海东市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记者沿路处处都能听到当地利用光伏产业扶贫的故事。

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立足高海拔和日均日照时长达8小时等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塔拉滩建成了光伏发电基地,其中容纳5县11个村采取“飞地”模式集中建设的50.5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探索出生态治理、新能源产业发展、贫困户增收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路径。

“一是设置与贫困户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光伏公益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二是大面积铺设光伏板遏制风速、涵养水土,改善局部生态。”海南州扶贫开发局局长王学军说。

有了光伏板遮挡,荒滩上的草慢慢长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每排太阳能电池板的尽头,都竖有带着扶贫村名字的标牌;太阳能电池板下绿草繁茂,还特意留出1米多的高度,方便羊群穿行吃草。秋冬季节,除草消除火灾隐患也成了如今当地扶贫的工种。

光伏好效益带来扶贫好收益。塔拉滩园区设置脱贫户光伏公益岗位5664个,安排上岗1427人,发放工资174.23万元,为贫困群众带来好机遇。

新媳妇进家嫌穷,一个月就跑掉的西台村民马生建,潦倒半生,直到去年快50岁才又娶了媳妇。

“多亏了光伏分红,我还能去园区放羊,算下来每月能挣3000元。”在鲜花盛开、蔬菜满园的家中小院里,马生建边聊边顺手拔了几个萝卜递给我们。

因为光伏,成千上万个“马生建”“像重新活了一次”。

一路走来,一个感受越发明显:不论身处何处、环境如何艰苦,各地干部群众都能变废为宝,拿来喂牲畜。

且末县畜牧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县已建设19个养殖小区,约4500个低成本牛羊圈舍,累计节约资金超过4360万元,未来规划在全县共建设41个养殖小区,“羊圈是给羊住的,不是给人看的,盖得再精美也没意义,钱应该花在刀刃上。”且末县委书记徐凯说。

同样,在当地的枣农们看来,红枣是用来吃的,个头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安全优质。

且末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脱贫攻坚重点县,艾萨2017年实现了脱贫摘帽,除了养羊,他还种了15亩红枣。从前年开始,艾萨跟很多枣农一样,不再

想办法利用好优势资源来致富。哪怕只有一束光,也要用来照亮群众的日子。

目前,青海累计争取光伏扶贫指标721.6兆瓦,每年发电预期收入5.7亿元,直接带动8.74万户贫困户增收。其中村级光伏扶贫指标471.6兆瓦,实现了全省1622个贫困村村均290千瓦全覆盖,村均年度收益达到30万元左右,收益期长达20年。

“有了更辽阔的远方”

9月,开学季。兴海县安多民俗文化村的普化加,走进了青海民族大学,成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大一新生。3年前,他随长辈搬出贫瘠大山。如今的他,成了全家奔向更好生活的新希望。

9月,收获季。兴海县夏塘村的尤拉太转正了。去年从青海大学毕业后,尤拉太被纳入一家电力企业的就业扶贫人才专项招聘计划,成为一名水电站实习员工。他说:“转正后工资会涨,助学贷款很快就能还清了。”

如果说,易地搬迁是住上新房子,光伏产业是鼓了钱袋子,那么对教育的重视、观念的转变,则是贫困群众希望看到的,是脱贫攻坚中耀眼的光。

“脱贫攻坚”“15年免费教育”……记者在青海藏文搜索引擎“云藏”看到的这些排名前10位的热词,充分透露出高原群众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期盼之情。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倾力攻坚,全省42个贫困县,162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实际减贫53.9万人,高原大地发生巨变。

一场雨后的贵德县,丹山碧水蜿蜒相映,河谷林郁葱葱。

在贵德县常牧镇切扎村,村民万德卡讲起两年前的场景,笑得合不拢嘴:当时,他作为脱贫光荣户代表到县里领奖——一辆农用三轮车,还即兴演讲了5分钟,“告诉大家是怎么致富的”。

人口多,草山少,5年前,万德卡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5年来,万德卡一家不仅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还用扶贫专项贷款投资羊羔生意,去年开始他又担任草管员,生活红火了起来。

“等、靠、要,是拔不了穷根的。有党的政策帮助,我们更要自己去洒汗水、加油干。”万德卡的大儿子已经在青海民族大学读大二了,他自己还准备再投资开一个牧家乐。

当好政策遇上好干劲,双手就能创造好日子。

这几天,青海阿妈罗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藏族小伙儿斗本加,正忙着给当地的文化旅游宣传片进行后期制作。

30岁的斗本加带着几个伙伴,创办文化传播公司,已经拍摄了多部纪录片。斗本加这样说:“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家乡的巨变。”

镜头下最美的风景,莫过于“人”。

去年,22岁的空姐周毛才从福建厦门航空公司辞职,返回家乡海南州工作。

“读书工作6年后回来,家乡不仅建筑更高了,还有了越来越多的电商、外卖、网约车。家乡更美了,生活也更方便了。”记者面前的这个藏族女孩,装束时髦,腼腆之中透出这个年纪少有的自信。

说起沿海和家乡的异同,周毛才让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家乡有一天也能拥有机场,让更多的鸟儿飞到更远更辽阔的地方。

一旁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其实,离青海湖不远的海南州机场已在研究和规划中……

新华社西宁9月19日电

“破”羊圈、“小”红枣:大漠边城的别样经济账

废旧木条围起来的棚栏和圆门、水泥砌的暖圈和食槽……艾萨·司马义自家盖的羊圈从外面看起来略显破旧,但圈里的羊似乎并不在乎,悠然地吃着芦苇秆制成的饲料。

艾萨的羊圈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兰干村,羊圈是他利用废旧的木料、门板和外购的水泥,在街坊邻居的帮忙下盖起来的,总共花了约7000元,除去政府补贴,自己才掏了1000多元。

像这样“破旧”的牛羊圈在兰干村的养殖小区里随处可见,有的圈里还能看到散养的鸡,棚顶上还有鸽窝。养殖小区里的圈舍是四户相邻而建,呈田字形,相邻两个

圈共用一面墙。

托格拉克勒克乡党委书记尤志恒介绍,这是且末县近年来推行的低成本标准化畜牧业养殖,鼓励当地牧民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甚至连一颗钉子都争取废物再利用”,降低圈舍建设成本,将经济效益最大化。

尤志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设一个375平方米的圈舍,用彩钢瓦等材料搭建新式圈舍需要花费近14000元,而搭建低成本圈舍平均仅需约6000元,节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七八只生产母羊。

此外,当地还鼓励通过牧羊集中托养的方式解放劳动力,在饲料供给方面,地里的杂草、河边的芦苇、路边的落叶等

都能变废为宝,拿来喂牲畜。

且末县畜牧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县已建设19个养殖小区,约4500个低成本牛羊圈舍,累计节约资金超过4360万元,未来规划在全县共建设41个养殖小区,“羊圈是给羊住的,不是给人看的,盖得再精美也没意义,钱应该花在刀刃上。”且末县委书记徐凯说。

同样,在当地的枣农们看来,红枣是用来吃的,个头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安全优质。

且末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脱贫攻坚重点县,艾萨2017年实现了脱贫摘帽,除了养羊,他还种了15亩红枣。从前年开始,艾萨跟很多枣农一样,不再

施化肥,不再喷洒化学除虫药物,利用养羊生产的有机肥来种红枣,“种枣除了枣苗和浇水,基本没有种额外成本”。

据徐凯介绍,当地的红枣需要进行5年的有机生长转换期,通过严格的检测后才能认证为有机红枣,价格也能卖到普通红枣的两倍。当前且末进入有机认证程序的枣园超过5万亩,今年拿到有机认证证书的枣园将达到3.3万亩。

艾萨家中的枣树已经挂满了红枣,果实已经开始泛红,个头不是很大,但很饱满。“去年卖红枣赚了6000多元,等通过有机红枣认证了,日子就会更甜了。”艾萨说。

(记者张钟凯、张晓龙)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